

哲学人类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意〕巴蒂斯塔·莫迪恩著

李树琴 段素革译

王晓朝审校



清华哲学翻译系列

主编/王晓朝 副主编/王路 艾四林



清华哲学翻译系列

主 编 王晓朝 副主编 王路 艾四林

哲 学 人 类 学

〔意〕 巴蒂斯塔·莫迪恩 著

李树琴 段素革 译

王晓朝 审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人类学/(意)莫迪恩著;李树琴,段素革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2
ISBN 7-207-06451-9

I.哲... II.①莫...②李...③段... III.哲学人
类学 IV.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821 号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Battista Mondin
Urban University Press, Rome

责任编辑:徐冲 唐栋
装帧设计:于克广

哲学人类学

Zhexue Renlei Xue

[意]巴蒂斯塔·莫迪恩 著
李树琴 段素革 译
王晓朝 审校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451-9/B·219

定价:15.6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中译者序言

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常新的问题，只要人继续存在下去，关于人的种种疑问将永远不会消失，这既是一个人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具体问题，更是一个引起哲学家们进行无数追问和探索的永恒问题。

自近代以来，随着哲学与科学的分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的问题成为多门科学研究的中心，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关于人的存在的某一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人的认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些学科无一例外都无法对人的本质、人的起源与命运作出解释，无法消除人的精神上的焦虑、烦恼和痛苦，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单凭科学技术手段来解决关于人的存在的所有问题，破解人的神秘的重担被重新委以哲学。

哲学人类学就是以人为主题、专门对人进行研究的哲学分支。虽然哲学史上对人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哲学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术语的使用却是发生在 20 世纪的事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首次系统地描述了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建构起了哲学人类学的基本框架，舍勒的思想对后世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哲学人类学在其建立之初就对实证科学关于人的某一方面做出的最新研究成果采取了批判性的运用，现代哲学人类学在对人及其特征的阐述中愈发不能脱离最新的经验科学材料的支持，意

大利学者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写作其《哲学人类学》时也采用了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之为基础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对人进行全面的研究,试图揭示出人的本质、来源和命运。在哲学人类学方法论这一关乎整个学科的合法性的问题上,莫迪恩认为哲学人类学需要一种复杂的方法以区分现象学阶段和超验阶段,现象学阶段的任务是借助客观观察和内省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所有关于人的存在的知识,超验阶段的任务则在于探究这些知识的终极意义,作者遵循的是从人类的主要的具体活动入手来追溯人的存在本身这样一条近路。

全书在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人类行动的现象学,作者在这部分中花了大量篇幅对生命、知识、意识、自由、语言、文化和劳动等人类主要活动进行了探索和分析,认为人的这些活动具有肉体性、精神性、优越性和超越性这四个特征,虽然有些动物也具有其中的某些特征,但人类的这些活动所包含和展现出的无穷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出人优越于动物之处,也揭示出人的存在具有肉体性和精神性两方面的维度,更揭示出人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朝向无限的谋划,人能够不断地超越自身;在题为人的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中,作者试图以第一部分的探索和分析为基础,运用推理论证的方式去寻找自我超越、灵魂、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人以及死后的存在等独特的、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最终根源,作者认为天主教是能够说明所有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的唯一解释:人进行自我超越的动力来源于天主,自我超越的目的是天主;精神、灵魂是人最独特的维度,人的价值存在于精神之中,灵魂由天主直接创造出来;人类的绝对价值不是自足的,而是植根于天主的绝对价值之中,由于天主的仁慈,每一个人都具有永恒的价值;人的灵魂不朽,由于肉体从属于灵魂,所以人们盼望能够实现奇妙的肉体的重生。

统观全书,作者不但在横向的层次上逐一展开哲学人类学的理论要点,而且在论述每一理论要点时都追溯了历史,引用了大量取自古希腊、基督宗教、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文献,也包括一些当代最新的哲学、神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成果。莫迪恩的《哲学人类学》力图凭借详尽的文献资料和深刻的理论分析揭示出一幅关于人的存在的全面的、立体的景象。如果说在对人类的主要活动进行现象学探究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始终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的谋划究竟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作者看来,关于人的谋划具有某种矛盾性:一方面,人的肉体被局限在时空的物质范围内;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却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如果这一谋划是可能的,它究竟何以可能?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则在所罗列的诸种观点中做出了有神论的选择,由于天主的慷慨和仁慈,具有绝对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珍视的、崇高的!

与其他一些哲学人类学学者的基点和立场不同,作者认为天主是人的存在的最终根源。这一论点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但对于我们拓展和深化对于人的思考和研究、进一步把握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特点仍有一定的帮助。愿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为国内同仁和有志于哲学、道德和文化研究的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份共享的有益资源,并因此而推进我们在这些领域里的对话和交流。

译者

2004年9月于清华园

“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学术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汪子嵩 周辅成 何兆武 杜维明

主 编:王晓朝

副 主 编:王 路 艾四林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俊人 王晓朝 王 路 卢 风

艾四林 肖 巍 邹广文 卓新平

赵敦华 唐少杰 蔡曙山

序 言

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

对于作为人而存在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和问题(关于地球、天空、月亮、星辰、空气、水、原子、细胞等物质,甚至关于天主)只有在指向我们的存在时才具有关联意义。

对于人来说,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了解自己的命运、生命的连贯性和内在维度是什么……所有这些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对其他事物(狗、猫、马等)熟视无睹,却不能对我们自己漠不关心。我们必然会使自己全神贯注于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的存在价值。

“人是谁?”这是一切疑问的疑问——最紧迫、最尖锐的疑问。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然而又是一个常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具体问题,而不是抽象问题;是一个个人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为自己,其次是为他人,期望自己对于人类之谜的解答对他人也同样有效。“人向自己提出了关于自身实在性的疑问。他不可避免地要向自己询问这一问题,因为对他来说,他自己就是一个问题。但是,精神和历史事件给人带来的问题越多,人面临人类秩序之混淆和瓦解的威胁,并直面人之存在,人就越困惑不解。因而,关于人的本性、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存在的意义等问题都有一种全新的严肃性和

紧迫性”。^①“人的本质总是在展现其新的深度,不断地使这一问题获得更新。因此,关于人性的这一疑问将永远不会消失。人的心灵不断地进行质疑和探索,只要人有思想,这一问题就不会消失。纵使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反应,但不管怎么说,它们都启发了人们对相关现象或问题的理解——有关人的生存的哲学解释必须肩负这些问题。”^②

“人是谁?”这是一个只有哲学才能探询的疑问,也许只有哲学才能够在理性的层次上找到一个充足而彻底的答案。在这一问题上,用科学取代哲学来破解人类之谜显然是荒谬的。毫无疑问,随着当今时代科学知识的进步,多门科学正致力于对人的研究活动,对有关人的实在的许多方面的理解和阐述做出了贡献;但必须承认甚至没有一门科学成功地涉及到关于人的存在的主要疑问,如人的起源、人的命运、人的深奥的存在等。没有一门科学能够破解疼痛、罪疚、痛苦、自我超越和死亡的奥秘。对自身的疑问进行探询和解答当然是人的责任……但是,人无法借助实证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经历了启蒙主义和实证主义冒进的今天,科学家内部或哲学家内部已经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种高度的一致。科学家们在意识到他们的方法和手段不能解决终极问题之后,已经对他们的知识进行了重新的评价;因而在今天,他们主动地将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哲学,如果解决方法是可能的话。哲学家这一方已经意识到他们已经给予和能够给予科学、用以消除人的奥秘的东西事实上非常少。卡西尔的相关认识极具权威性:“这就是现代哲学发现它自身所处的奇特状况。就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知

① 科雷特(E. Coreth):《哲学人类学》,意大利文版, Morcelliana, 布雷西亚, 1978年版, 第9页。

② 科雷特:《哲学人类学》, 第11页。

识之源泉而言,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时代能比我们的时代优越。心理学、人种学、人类学和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得令人惊异并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大量材料。我们用于观察和实验的技术工具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我们的分析力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深刻。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掌握和组织这些材料。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的丰富性相比,从前的材料显得非常贫乏。但是,事实的丰富并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除非我们能找到一条带领我们走出迷宫的线索,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排除任何概念的分散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①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人类学学者之一的马克斯·舍勒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日益增多的研究人的具体科学虽然是有价值的,但它们对人的本质的掩盖往往多于对人的本质的揭示。除此之外,特别是达尔文主义对于人的起源的理论受到了重创,我们可以说,人自身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成问题。”^②

因而,破解人的奥秘的高贵而又沉重的重担在今天超乎往常地落在了哲学家的肩上。

“人是谁?”这是一个有史以来一直摆在东西方哲学家面前的疑问,但是,哲学未能成功地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最终答案,这一疑问始终摆在那里。因此,这一具有紧迫性、饶有趣味的相同疑问又在重新表达自身。

“人是谁?”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因为它关涉的是我们自身,而不是远离我们的某些实体。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存在是复杂的,它同时具有精神性和物质

① 卡西尔:《人论》,意大利文版,Armando,罗马,1968年版,第75页。

② 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英文版,培根出版社(Beacon Press),波士顿,1961年版,第6页。

性,二者被困于肉体这一狭小的空间之内,但是又能凭借精神取消宇宙的一切限制。因此,“最奇妙的宇宙秘密,与我们最贴近的,始终是人。”^① 进入我们的世界、探索人类的本质核心要远比登上月球困难得多,特别是不仅摧毁了我们的许多城市,而且还颠覆了我们的意识,引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被卷入一场似乎在任何层次上——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神职人员,甚至普通人,既包括个人又包括群体——对于人的含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即自由的存在者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文化混乱中。

为了摆脱这场控制我们、使我们遭受痛苦的时代危机——这一危机的精神性甚于物质性、文化性甚于经济性和政治性——哲学迫切需要集中力量于人的奥秘(先于自然、物质、宇宙、存在、语言等的奥秘);为了了解和确定人的高级价值,它需要专注于探索人的种种奇妙的活动(生活、认知、交谈、做事情、意志、欲望、爱等)。加布里尔公允地证实道:“崭新的世界必须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之上,这一精神基础是关于人的确定的实在的最深刻的知识。当旧有的基础开始崩溃,不能构筑起抵御毁灭和瓦解之巨潮的屏障时,这一崭新的基础必须被提升并代替旧有的基础,以一种更强、更高之潮向上涌动和攀升。”^②

对人进行的哲学研究被称为哲学人类学。我在数年前发表了一部关于此种讨论的论著:《人是谁?》,这本论著在意大利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本书中,我将沿着基本相同的线索对这一主题进行重新思考,但在两方面上做出了巨大的调整 and 改变:(1)明显减少了对历史文献的引述;(2)继续深化了理论分析。

① 容格:《灵魂的实体》,意大利文版,Boringieri,都灵,1970年版,第7页。

② 加布里尔(L. Gabriel):《确定中的人和世界》,意大利文版,Marietti,都灵,第186页。

让我借此机会热诚地感谢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他们的鼓励使我在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哲学人类学领域辛勤地工作着。本书作为哲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乌尔班宗座大学(Pontifical Urban University)的支持下实现的,在此一并对乌尔班宗座大学致以诚挚的谢意。

巴蒂斯塔·莫迪恩
罗马乌尔班宗座大学
1983 年

总 序

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

清华大学哲学系复建之初(2000年5月),万俊人教授提出组织出版“清华哲学翻译系列”的设想(同时纳入清华哲学系学术规划的还有“清华哲学研究系列”、“清华哲学教材系列”和“清华哲学年鉴”,均已先期问世),得到本系诸多同仁的响应,也得到国内外同行和友人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因为学者们深知:翻译对于中国社会与思想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发展与创新,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养育,对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与互动,具有不可替代之功。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

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

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① 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他于20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西方哲学的代表”(张东荪语)。出版家张元济、高梦旦高度重视翻译,先后主持商务编译所的工作。张元济先生在出版严复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时强调说,这是“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事国民之精神”^②。高梦旦先生指出:“互市以来,天下竞尚西学,竞尚西文”,但是精通西文不易,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为了让多数知识人了解西学,“唯以译书济之,则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者,将千万人而未已。”^③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又有思想倾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

①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转引自陈应年等《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的回顾与展望》,《翻译通报》1994年第2期。

③ 高梦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转引处同上。

著述,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不仅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自从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诸先生于1927年创刊《哲学评论》后,中国才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自从192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举行第一届年会起,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有自抒哲学理论,自创哲学系统的尝试。”^①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播,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40种。”^②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贺麟先生说之所以把黑格尔哲学在中国传播开来,“与其说是个人的兴趣,毋宁说是基于对时代的认识。”“黑格尔的学说于解决时代的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而黑格尔之有内容、有生命、有历史感的逻辑——分析矛盾、调和矛盾、征服冲突的逻辑,及其尊重民族的历史文化、尊重自求超越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实足振聋起聩,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觉与鼓舞,对于民族性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吾人既不舍己骛外,亦不敢步自封,但知依一定的理则,以自求超拔,自求发展,而不臻于理想之城。”^③

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融会中西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①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② 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③ 贺麟:《黑格尔学述》后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00页。

如,熊十力先生在改造佛学唯识论基础上吸取柏格森哲学建立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先生将英美新实在论与程朱哲学结合,通过分析方法建立了“新理学”;金岳霖先生运用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逻辑学和认识论建立了“论道”;贺麟先生融德国哲学与宋明理学建立了“新心学”等等。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作为基础,这些融会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现代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还需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有直接的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对郭斌苏、景昌极所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31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康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巴曼尼德斯篇》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注释,使它不仅是原作忠实的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表现了中国学者翻译诠释柏拉图著作,勇攀世界学术水平的气概。贺麟先生对此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社1947年版,第40页。

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362本,其中哲学126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43种,其中哲学15种。

1956年,人民出版社在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配合下,主持拟定一份《外国名著选译20年规划总目录》,选列了1614种书目作为选题计划,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挂牌后,该出版工作移交商务印书馆负责。这项翻译出版规划的制订依据是“补课论”,即认为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和文化上落后,在吸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方面,做得很不够,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在中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便责无旁贷地完成这项前人未能完成的任务。这项规划的前十年(1956—1966)共翻译出版西方哲学原著129种,而后十年(1966—1976)由于“文革”的原因,只出版了10余种。^①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7年共出了300种,其中哲学类的有104种。此外,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人们认识到:“享有盛名的世界各国历代学术著作,不管成于什么时代,出自哪个地域,形于何种文字,都是今天人类拥有的共同精神财富。”(贺麟语)“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的

^① 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第141页。